

深謀遠慮奠磐基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

(續完)

● 陶英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暨胡適紀念館主任)

萌生倦勤真相複雜

辭職經過：中研院遷台後，在朱院長
的苦心經營下，於南港購地重建，由最初
之一個半研究所，陸續恢復了植物、動物
、化學三個研究所籌備處，增設了民族學
、近代史兩個研究所籌備處；原來處理比
較重要的院務，只能用談話會方式進行，
這時也可以舉行正式的院務會議了。全院
兩個最高的權力機構：院士會議及評議會
，也已可以合法的召開。這些重大措施，
終於使中研院起死回生。正在徐圖繼續發
展之際，朱院長忽於四十六年八月間表示
倦勤。各界不明真相，致有種種不同的傳
說與揣測。據曾任代總幹事的楊樹人先生
，在四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所發表〈中央研
究院最近的十年〉一文中說，朱院長之倦

勤，一是健康關係，自四十三年施行胃部
手術後，健康大不如前，在四十六年三月
間，即與他商量辭職的事，並且一直在不

八兩天連續主持評議會第三屆第二次會議
以後，二十那天早晨再去谷關繼續休養，
我和少數同仁在臺北車站送行。他一到便

斷的考慮中；另一個原因，就是為中英文
教基金董事會，將最後一筆餘款撥助中研
院的運用問題，引起有關方面的不快，而
萌生去意。經楊先生揮汗查卷，草擬說帖
，向有關方面說明，終於「刷清了所有的
誤會，擯除了一切中傷的誣讒。」（〈大
陸雜誌〉第十六卷，第七期，頁二〇一；
楊樹人，〈懷念朱驢先生〉，傳記文學
，第四卷，第一期，民國五十三年一月，
頁廿四。）五十二年一月三日，朱先生病
逝。楊樹人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撰寫的
〈懷念朱驢先生〉文中，又憶述朱院長辭
職經過云：

拿出親自草擬的辭呈，囑我代為繕發，他
說是辭句可以潤色，而要義則不必改動。
我本來和他商量好，待事體清楚再上辭呈
，我不明白何以提前。他說：「讀書人，
應如是耳！」是的，讀書人何能沒有讀書
人的氣節？我於是默不作聲，不能進一言
，後來我們只就原稿修改了一個字。」
（傳記文學第四卷，第一期，頁廿五。）
既已「刷清了所有的誤會」，為何仍
辭？楊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最近的十年〉
一文中說，若干事端當時還不能全無隱諱
的寫出，在〈懷念朱驢先生〉文中又說
，仍然是沒有到達和盤托出的時期。所以
欲言又止。到了七十六年四月，楊先生又

「朱先生（四十六年）八月十七和十

在（胡適之書信一束（上））一文中，再透露了一些線索：

「那年（四十六）夏天朱院長家驊（駱先）先生的政治敵人供給了一些未盡確實的報告，引起最高當局的誤會。事與研究院本不相干，不過表面上仍然牽涉到院中的措施。情況雖然複雜，但是我認為這是不公道，……據總統府黃伯度局長面告，有人認為中央研究院直屬總統府，總統有權特派大員『整理』研究院，而且這個『大員』已經是呼之欲出了。我立刻向黃局長表達，……照規定院長出缺，應由評議會選出三個候補人，報請總統圈定。」（《中外雜誌》，第四十二卷，第二期，民國七十六年八月，頁十七。）

最高當局不再重用

最高當局對朱院長之不滿，似乎還可以向前追溯：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總統宣告引退，以彌戰消兵。六月三日，李宗仁代總統任命閻錫山組「戰鬥內閣」，以朱先生為副院長，朱先生遂因此「失寵」；及至同年十二月底，朱先生呈辭行政院副院長職務，胡頌平在其所著《朱家驊年譜》中委婉的點出：「已經得到

蔣總裁的諒解。」（胡頌平著，《朱家驊年譜》，頁八十三）。

朱院長辭職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政府正在多方爭取海外學人來台服務，為安排旅居美國的胡適先生，最適合的職務自然是中研院院長。大約在四十六年秋，即有院長室的主人已成胡適先生的風聞。王世杰在其五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記其繼胡先生任院長的經過時，即明白指出：

「駱先身體健康不佳，且前此去職，係蔣（中正）先生所要求。」（《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七冊，頁一。）

而胡先生在其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則更清楚的說是「被逼迫去職」：

「為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辭職的事，十一月三日召開評議會，選舉三個候補（補）人，由總統選任一人。此次駱先辭職，實等於被逼迫去職。海外有六個評議員，都很憤慨。」

今晚勉強寫信委託王世杰先生代表我投票：①朱家驊，②李濟，③李書華。又寫長信慰問駱先。」（《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〇

年十二月印行，第十八冊。）

據一位不願透露身分的前輩函告：戴傳賢（季陶）與蔣中正原是生死之交，而戴與朱先生在廣州中山大學時，建立了道義之交；蔣以戴、朱與廣東派對抗。在北伐前後，蔣須對各方面兼容並蓄，其所以重用朱先生，主要的是朱與德國的關係，以達到爭得德國的軍事顧問。及世界大戰結束，德、日垮台，朱之重要性自隨之降低。至三十八年戴自盡於廣州中山大學的東山，即朱失寵之先兆。

至於導致朱先生「倦勤」的直接原因，可能與蔣中正總統到中研院巡視事有關。據胡頌平《朱家驊年譜》云：

「（民國四十六年四月）三日晚上，蔣總統歡宴全體院士，席上談起在美的學人有雙重國籍的可以當選院士。又談起南港這地點三面環山，非常幽雅，適宜作研究工作，不過進去這條路沒有鋪好柏油，不無遺憾這些話。隔了幾天，總統下了條諭，限兩星期修好。院中聽說條諭給了警務處。後來派人到總統府抄錄條諭，辦了公事給台灣省政府，已是四月底了。……八月四日下午五點多，蔣總統夫婦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巡視。從南港到舊莊的路

面要鋪柏油的指示，省政府尚未動工。」
 (胡頌平著，《朱家驊年譜》，頁九十九
 一〇〇。)

路上的顛簸，使蔣總統很不舒服；及

到中研院，已經是下了班的時候，見到有人因天氣太熱而打赤膊，認為不雅，門口又無警衛，如果史語所的古物被搶走怎麼辦？乃大發脾氣。回去後即下令整頓中研院，旋又令朱院長辭職。

由於上述幾種原因，朱院長於是不得不「倦勤」，其辭呈遞出後，大約在一個禮拜或十日以後，即奉批照准，但未立即發表。依法要由評議會秘書召集會議，選舉院長候補人三人。四十六年十一月三日，第三屆評議會在南港舉行第三次會議。選舉前夕，評議員在台北自由之家非正式聚會，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約評議會秘書楊樹人到總統府面談，透露希望選出胡適為候補人之一。楊樹人到達自由之家後，婉轉說明與張秘書長談話內容，評議員梅貽琦即以徐緩而深沉的音調說：

「胡先生如能當選，自會選出，我們並不奉他人的意見而選舉。」（《中外雜誌》，第四十二卷，第二期，頁十八。）

簡單數語，已將讀書人的風骨表露無

遺。而胡適所說海外評議員的憤慨，竟以行動表示抗議，即如他自己的委託票一樣，再選朱先生為候補人。據主辦這次選舉的楊樹人說：

「選舉之前尚有一小小插曲，傳聞若干海外評議員鑒於朱先生維持研究院十八年，甚為辛苦，為表示敬意，要再選他為候補人之一。消息傳來，朱先生深恐再引起誤會，諸多不便，囑我設法代為解危。我報告說，評議會選舉，向來獨立，無人敢事前游說，我不能擔保任何後果。我揣測，朱先生的票數不會太多，只要不達十票，便可平安無事。我便中略向兩三個評議員問話，說朱先生辭職照准後，生活安閒愉快，如釋重負。言外之意，他不願再有糾紛了。在第一次投票時，他得到八票（楊先生另文說是九票），幸而後其票數減少，免除一場不必要的困擾，朱先生頗為滿意。」（《中外雜誌》，第四十二卷，第二期，頁十八。）

選舉結果，胡適以十八票，李濟及李書華各以十票，當選為候補人。第二天，總統特任胡先生為院長和准許朱先生辭職的命令同時發表。胡先生以病體未復，一再謙辭，後經各方面懇勸，方允休養復原

後回國就任，期間由李濟暫代院務。移交手續，直到四十七年一月十一日才補辦完竣。朱先生得以卸下十八年來中研院的擔子。

對中研院的大貢獻

在評議會選舉院長候補人之前，好幾位評議員認為朱院長十八年來不辭勞瘁，培育保護這個機構，應該表示敬佩和感謝之意，當經一致決議書面慰問，會後由全體評議員親到其寓所面致。在該慰問書中，很清楚的看出他對中研院的許多重大貢獻。茲照錄原信如下：

「朱院長駱先先生賜鑒：此次第三次評議會開會之時，適值先生體弱多病，在辭職中。緬懷本院為全國最高學府，創立至今，已三十年。先生於早年歷任評議員，總幹事，贊襄鴻業。嗣繼蔡先生之後，主持院務，十有八年。抗戰期間，添設植物、醫學、數學各所，擴展院務，漸臻完備。及共匪叛亂，大陸淪陷，努力搬遷歷史語言數學兩所。在艱苦中，為國家保全圖書文物之精華，維持學術尊嚴及研究水準，且為國家，繼續培植人才。近年建築南港院址，並在臺籌設近代史、民

族、植物、動物、化學各研究所，為國家逐漸奠定在臺之學術基礎。凡此貢獻，殊深感念。茲一致公決，專函慰問，並表示同仁敬佩之誠。謹肅奉達，敬祝健康。評議會全體同仁（簽名）敬啟四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大陸雜誌》，第十六卷，第七期，頁二〇五。）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院長以心臟病猝發去世。第四屆評議會於三月三十一日舉行臨時會議，票選吳大猷（十七票）、朱家驊（十六票）、王世杰（十五票）三人為第四任院長候補人。吳大猷時在加拿大，沒有擔任院長的意願；朱先生的健康，已日漸衰弱，不可能再任繁劇；總統特任王世杰為院長。朱先生在四十六年被逼迫辭職時，有些評議員感到不平，就要再將選他為院長候補人，為朱先生婉拒；這次再以第二高票將朱先生選出來，主要是感念他對中研院的功績和辛勞，表示對他的敬愛並沒有忘記；此外，似乎也在表現一下書生的意氣！

同仁愛戴建館紀念

五十二年元月三日下午，朱先生以心臟病發，在寓所溘然長逝。一個禮拜後，

即元月十日，中研院院務會議，一致通過以新建宮殿式之民族學研究所辦公大樓，定名為「朱家驊館」，作為永久紀念，明確表達全院同仁愛戴的熱忱。該大樓古色古香，是院中唯一的一幢中國式建築，至七十四年七月，民族所遷至另一新建的研

究大樓，原大樓不久即被拆除，改建為現在的行政大樓。在要拆除這幢大樓前，我適奉命調兼總辦事處秘書主任，曾於七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上午，會同土地規劃小組召集人鄔宏潘、總務主任趙保軒、人事主任周國卿、人（二）副主任閻琴南，同去晉見韓忠謨總幹事，建議將擬興建的行政大樓地點改在現在的地球所位置，以保留「朱家驊館」；韓不同意。我即說：機關首長的辦公室不宜靠院大門太近。他斥責我是封建思想作祟！我又說：如一定要建在此地，可將院門改至一百巷口——即現在新的院大門處。他說，改大門會影響首長的風水，不能動。在力爭保留無效後，「朱家驊館」即失去了蹤影，走入歷史。現在中研院決定將一進新大門的馬路，命名為「家驊路」，沿此路到學術活動中心的橋，命名為「家驊橋」。也是一種有意義的感念方式。

六十元感人的故事

朱先生去世，到今天恰好是三十七年又六個月，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他胼手胝足、心力交瘁，在南港重建中研院的經過，對院中年輕一輩的同仁來說，恐怕已是天寶遺事了。茲再附帶報告一個關於六十元的小故事，想必也早已為同仁們所淡忘。

筆者是五十三年七月到中研院工作的，那時每人薪水袋中都有六十元的交通費，直到七十六年六月，才改發車票補助費，未住院區附近者，所領不止六十元，住院區附近者，則不再補助。這六十元的來歷，經向院中前輩們打聽，才知道其中蘊藏了一則感人至深的故事。

中研院初遷南港時，此地交通十分不便，對外聯絡唯一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是運煤的小台車，附近連賣菜的也沒有，太太們買菜一定要到南港街上去，台車的車資是一元，來回就是兩元，當時各家都沒有冰箱，必須每天跑一趟南港，一個月就需六十元的坐台車費，是一項相當大的開支。朱院長為減輕同仁的負擔，特排除萬難，設法每人補助六十元交通費。對當時

中的同仁來說，這六十元真是一筆很大的收入。朱院長對同仁無微不至的照顧，由此可見一斑。

還君公允歷史評價

自民國十六年蔡元培先生創辦中研院起，朱先生即參與籌備工作；二十五年出任總幹事後，更是積極贊襄院務；及二十九年，繼蔡院長主持院務，至四十六年十月卸任，歷時三十年。

在這三十年中，朱先生在政府擔任過許多極其繁重的職務，而且常數職兼顧，均妥為處理。在這段期間，正值國家多事之秋，先是抗日戰起，中研院自京滬西遷，並隨戰事之變化不斷播遷，各研究所散處大西南各地，總辦事處則必須設在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勝利後，再陸續復員京滬。喘息甫定，又播遷來台。在遷移的過程中，既要顧及人員的安全和食宿居住，又要維護圖書儀器等的完整無損，在經費不足、交通工具極度困難的情形下，其艱辛可知。

在顛沛流離中，朱院長仍極力設法繼續成長發展，不僅完成了中研院的體制，並增設數學、醫學、體質人類學三個研究

所籌備處，並將動植物研究所各自獨立成所，而研究工作也未中輟。至於所籌設之近代物理（即原子能）研究所，雖未完成，亦可看出他掌握了時代的需要及學術發展的方向。及至遷台後，僅餘數學和歷史語言兩個研究所，幾有解體之危，朱院長不僅堅持要維持下去，並設法繼續發展，於是又擔負起籌措經費、找尋院址、購地建屋等起死回生的重任，除陸續重建植物、化學、動物三研究所外，並增設民族學、近代史兩研究所。而停頓八年之久的院士會議及評議會，也恢復集會，使中研院從半停頓狀態中導入正軌，為在台之復興奠定了基礎。正由於他對中研院、對國家的諸多貢獻，所以對其被迫去職，乃至寂

寥以終，令人感到不平！至於去職的原因，當時忌諱尚多，知道真相者，不敢說，更不敢寫；惟「今我不述，後生何聞！」本文只是根據一些文字資料隱隱約約所透露出的蛛絲馬跡，理出一些可能的線索。至祈知道實情的前輩們說出來，最好是寫出來，為歷史留一正確的紀錄，使朱先生得到應有的評價。

俗語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中研院的歷任院長，都各有其不同的貢獻。今天在此回顧朱院長對中研院的許多不可磨滅的貢獻，飲水思源，怎能不令人長相懷念及由衷的崇敬！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八日於近代史研究所（中大學術基金會提供）

聖文 拾夢 抒懷

隆重李 潔 著
出版新臺幣壹百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